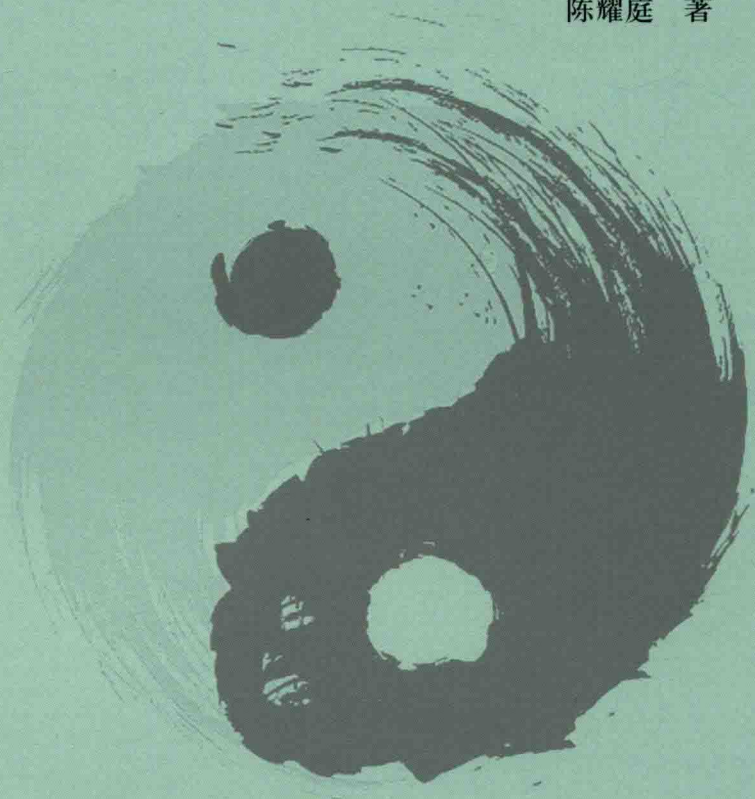


陈耀庭道教研究文集

上卷

陈耀庭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陈耀庭道教研究文集

上卷

陈耀庭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序 言

2014年初,陈耀庭先生将他三十多年来所写作的有关道教论文和文章交给我,建议作为上海太清宫道教文化丛书之一,结集出版,我欣然接受。

陈耀庭先生,是我入道后的授业老师,前后约有十余年。对于他的学识和人品,我十分敬仰。平日有事,多喜欢向他请教。凡我所在道观有重大活动,也经常请他来指导、出谋划策,他总是认真负责、悉心帮助。为道观的规划、发展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此,当我把出版他的道教研究文集的计划提请道观管委会讨论时,全体班子成员一致通过,认为这是陈耀庭先生对道教文化建设事业的又一贡献。

陈耀庭先生,出身于道教世家,其祖父陈荣庆是清末上海县最后第二任道会司道会,其父亲陈莲笙是我的恩师,20世纪80年代起历任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和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二老都是道业精湛、德高望重的道教界知名人士。陈耀庭先生自幼聪颖,作为长孙,备受关爱,自幼被带入道场,耳濡目染,对道教感情日深,久而弥笃。按理说他应继承道门家业,终身奉道。

1949年,在他小学毕业时,正逢时局变化,祖父陈荣庆决定让他放弃去嘉定学道的计划,继续求学深造。1956年,在他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不但开阔了视野,学到了诸多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更使他从此能高识远见地审视道教。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没有任何宗教课程的设置。他在北大苦读五年,在众多名师教诲下,打下了扎实的文科治学的基础。得益于北京大学宽

松的学习氛围和丰富的图书资料,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上海涵芬楼影印的《正统道藏》,并且阅读了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等。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道教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1年,陈耀庭先生从北大毕业,因为健康的原因被分配回上海,在一所业余大学里教书谋生,似乎已经与道教无缘。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8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建宗教研究所,他被著名宗教学家罗竹风、副院长蔡北华点名调入,从事宗教研究工作,主攻道教,命运又使他与道教结缘。此后,他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年,直至2001年退休,曾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宗教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以及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等。在这二十年中,他还先后出访过法国、联邦德国、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并且在日本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从事长期研究工作。退休后,仍兼任四川大学985国家创新工程客座教授、上海道教学院顾问、新加坡道教学院顾问、香港道教学院顾问、香港全真道教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到了耄耋之年,他仍在为整理道教文化遗产和弘扬道教文化事业不辞辛劳地来回奔波。

陈耀庭先生研究道教,不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不是出于猎奇的爱好,而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出于他与生俱来的对道教的真挚情感。他所研究的道教领域与时俱进,通常都是当时道教界所急需的研究课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落实宗教政策后,道教进入了恢复和重建宗教活动场所、培养新一代教职人员的阶段。1986年,陈耀庭先生应上海市道教协会邀请,为上海道教学院第一届学员授课,教材均是他自己编写的。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上海道教学院的教学和《上海道教》杂志的创办上。此外,他还与刘仲宇教授合作编写了《道·仙·人》和《道家养生术》等

著作。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道教的发展进入了整理、编纂、刊印、流通重要经典,以及恢复、完善、创新、满足广大信众需要的道场科仪法事的阶段。陈耀庭先生在道教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帮助下,参与编纂了《藏外道书》、《道教要籍选刊》等道教经书的出版工作,同时对于一些存有争议的科仪展开研究,发表了有关进表、炼度、灯仪,包括香港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仪等一系列研究文章,为道教界提供了紧缺的经籍要典,为打开科仪禁忌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满足信众的信仰做出了贡献。

进入 21 世纪之后,陈耀庭先生因为退休和出国团聚,离开了道教研究的第一线。但是,他从中国道教发展的前景,以及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教与社会和谐、道教与自然和谐、道教与社会伦理、道教教育和人才培养等更为宽广的层面,继续从事他的道教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精华均被收集在他的这本论文集内。在这期间,他还利用为香港青松观的科仪作注的机会,对于一些常用的黄箓类科仪经籍做了源流传播的考证,对其内容作了分析和解释。最为称道的是,他把道教教义的研究,提升到道教神学的高度,发表了多篇关于道教神学的论文,出版了《道教神学概论》,是为我国第一本道教神学的专著。

陈耀庭先生说过,他的研究工作是现实的道教服务的。他说:“道教的发展需要我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我从来不做书斋式的、猎奇式的研究。”

陈耀庭先生对道教的研究,始终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与现代先进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听他的课,读他的书,常常会感觉既是传统的,又是新颖的,视野开阔,信息量大。以他为香港青松观所注解的九本科仪书来说,每本都有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仪经书逐字逐句的注解,

有的还有逐句的白话翻译。第二部分是附录。这些附录,都是他对该科仪潜心研究的成果。附录一般也有二个部分。一是从《道藏》和《藏外道书》中收集的有关该科仪的各种重要资料,二是对该科仪的产生、演变,以及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的研究。这些经文注解,能帮助道教界的经生、法师理解科仪,做好科仪。学术界的朋友也重视他的注解、附录,是因为它们涉及到科仪的思想、艺术和流变的研究,这些都是没有道教科仪活动体验的学者所欠缺的。据说,他的经书注解方法,来自于他的大学老师杨伯峻先生,即传统训诂的方法。他对科仪的研究,则综合了文献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采用了结构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浅出的功力,他的文章通俗易懂,深受教内、外人士的喜爱。

本文集收录了陈耀庭先生三十余年来在国内外书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55 篇,这是他除了专著以外的重要的道教研究成果之精选。分为上、下两册,共六章。第一章为道教思想和经籍研究,合计 9 篇;第二章为道教神学研究,合计 8 篇;第三章为道教史研究,合计 11 篇;第四章为道教斋醮科仪研究,合计 18 篇;第五章为道教文化研究,合计 7 篇;第六章为道教教育研究,合计 2 篇。其中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章 5 篇,90 年代的文章 22 篇,21 世纪以来的文章 28 篇,呈现出他的道教学术研究在 90 年代以后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陈耀庭先生在道教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除了老一辈道教学者以外,在当代同龄人中当属翘楚者。这当然要归结于他的天赋、家学和后天不懈的努力。但这还不够,也要看到时势造英雄的一面。如果没有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普照,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中国道教在新时期的恢复与发展,没有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要想干成一番事业同样是不可能的。

陈耀庭先生的研究,广搜博引,涉及道教史、经典、神仙、教义、神学、斋醮科仪、诗词、绘画、民俗、宫观、节日等众多领域,内容丰富,观点独到,精彩纷呈,可以看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道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曾经给予当代道教的恢复和振兴以极大的帮助和推动。而将这些成果集中编印出来,以飨读者,留给后人,必将会对中国道教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出版《陈耀庭道教研究文集》的目的所在。并借此恭贺陈耀庭先生七十五岁寿辰,期望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复兴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以不揣浅陋,谨以为序。

丁常云

2014年6月

目 录

序言 / 1

上卷

第一章 道教思想和经籍研究 / 1

论道教教义思想的结构 / 3

道教教义创建和发展过程的四次变化 / 18

加强道教教义思想的研究,适应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 / 47

构建和谐社会,责任在人自己 / 52

《阴符经》,巨人的教化 / 59

藏外道书和明清道教 / 63

藏外道书的收集及其价值 / 70

明抄本《玉笈金箱》及其主要内容 / 77

四种未见著录的道教典籍 / 87

第二章 道教神学研究 / 99

道和神 / 101

关于太乙救苦天尊 / 113

神仙事迹和道德伦理 / 135

道教神学的探索和研究及其重要意义 / 147

道教的神学及其时代特点 / 170

道教的“创世纪”及其与其他宗教的比较 / 183

神性即道性 / 196

关于“神人同源” / 214

道经的神性 / 234

第三章 道教史研究 / 249

论道教的实体化 / 251

全真弘传三论 / 274

清代全真道派适应低潮时期的三项历史经验 / 287

相互尊重,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 313

一件清代道教的重要史料 / 336

辛亥革命时期的道教和社会变化 / 340

面对 21 世纪的中国道教 / 348

城隍信仰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 359

从斋醮科仪说龙虎山的历史地位问题 / 371

道教在海外的传播 / 379

巩固道教恢复成果,抓住道教发展时机 / 388

上 卷

第一章 道教思想和经籍研究

论道教教义思想的结构

任何一种成熟的宗教都有独特的教义思想,它们是这一宗教对于宇宙和社会的基本认识,并由此规定该宗教的仪式或方术行为以及对教徒的规戒等。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有千余年历史的成熟的宗教,它有丰富的仪式、方术行为和成套的规戒,道教有自己的教义思想体系,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长久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一直认为“道家之术,杂而多端”,“道教,终究不过是一种法术,算不得纯粹的宗教”。^[1] 否定道教有教义思想,也就否定了道教作为一种成熟的中国宗教的资格。近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以及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发展,学界对于道教有了比较客观的态度和认识。本文就是对于道教教义思想从总体上作一个结构分析的尝试。

道教教义的核心

道教以“道”名教。以道作为它的基本信仰。因此,道就是它的教义思想的核心。在道教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宗派,如:五斗米道、太平道、全真道、正一道和净明道等,各派经文或有差异,科仪方术各有侧重,但是信仰道,以道作为教义的核心却是共同的。“学道君子,非路而同趣,异居而同

[1] 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81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第6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

心”，^[1]这个同就是同道。

道教的“道”，是秦汉道家的“道”的沿用和继承。从先秦时老子提出“道”直到东汉末年，道家有许多发展。两汉道家中，老子和“道”就已经被神化。东汉末年，农民运动吸收了道家思想及其神秘主义部分，将“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道”，作为宇宙观的基础。《太平经》称“道”是“万物之元首，不可得而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老子想尔注》将作为“天地根”的“玄牝”作为长生不死的方术的理论基础，称“生，道之别体也”，“道教人结精成神”。《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都以道家的小国寡民、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社会观的出发点。《老子想尔注》还将“道”和神联系起来，称道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于是，“道”就确立了它在道教教义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德”也是先秦道家的重要概念。《老子》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一章），因此，一般认为，“德”是道之功，道之用，道之现。《太平经》一脉相承地认为“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并且以“德”和“刑”相对立，称“德者与生气同力”，而“刑与杀气同处”。同时，《太平经》在社会观中将德“主养”的观念推衍为帝王之治。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则主张“道德一体”，认为“常德”就是“道德常在”，“玄德”就是天德，一直按道行事。^[2]《庄子》在《天地》篇中称“至德者”要“存形穷生，立德明道”，因此，后世的道教徒也就以“明道立德”作为自己信仰的最基本的内容。

[1] 《道藏要籍选刊》，第1册，第6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下引该书同此版本。）

[2] 《太平经合校》，第16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老子想尔注校笺》，第35、13页，香港，1956年。

从东汉到隋唐五代,道教教义思想体系逐渐完善,以“道”和“德”为核心的教义思想结构渐趋完整。唐代道士吴筠在《玄纲论》中认为,“天地、人物、仙灵、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见其终,探奥索隐,孰窥其宗”,^[1]其中已经包含了将对于宇宙、社会的认识区分为四个部分的思想,并且指出了它们由“道”和“德”生成的。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编纂的《道德真经广圣义》总结了前代六十余家的诠释笺注,认为“《道德经》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无不包,细无不入,宜尊之焉”。^[2]杜光庭还分析了以“道”贯串于天、人、神等三十八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认为,道教教义思想的结构框架至此大致完成。

道教教义结构的四个要素

——天道、地道、人道和鬼道

天道。“天”在上古三代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它有意志,有感觉,知人事,能赏罚。统治者不仅自命代天,也垄断着祭天的权利。道家把天说成是万物之一,不具人格,并且提出了最根本的存在是“道”,这无疑是对传统“天道观”的巨大冲击。但是,秦汉之间,祭天的传统宗教并未消失。道教继承了道家学说,抬出了自己的神灵系统、神学思想与祭天的传统宗教相对抗,因此,在某些外国学者眼里,这一“天道观”本身就包含着对正统的反叛意义。道家的“天道”思想,指的是以道来解释与天有关的内容,即:天的形成,天的构成和居于天中的神,等等。

[1] 《道藏》,第23册,第674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本书引《道藏》,均同此版本,以下注解不再赘述。)

[2] 《道藏要籍选刊》,第2册,第8页。

《老子》第四十二章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于“二”，有的注家认为是天地，有的认为是阴阳。对于“一”，有的认为是气，有的则认为一就是一。从东汉至唐代，道教一些有关创世的经典，对于“气”的名称和数量多有不同的叙述，但是由气生天、地、人的思想却并无变化。《太始经》就称“气清高澄，积阳成天；气结凝滓，积滞成地”。《太上老君开天经》也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直到元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影响，道教大量吸收《周易》的词语，才有人将“一”解释为“太极”，称道为无极，将“道生一”同“无极而太极”比附起来。道教的这种气分清浊，升降为天地的思想正是直接继承汉代的道家思想。不过，道教在发挥中又加进了神的创造力，《太始经》称，生成三气后，“三合成德，共成元老”。《太上老君开天经》称，天地形成之前，“太初之时，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师”，等等。

尽管上古三代的宗教以天帝为最高神，十分重视祭天仪式，但是对于天的构成却并无分析。直到南北朝时陶弘景编纂的《真诰》一书才有三十六天的说法，称“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必非三十六天之限”，等等。同为南北朝时编定的《无上秘要》称天有三界，即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共二十八天，三界之上另有“四梵天”，合计三十二天。《无上秘要》所引出自《度人经》，《度人经》中的三十二天按方向横向配置，每方八天，同佛教的三界垂直配置不同。大约到唐代初年，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垂直配置的天界逐渐代替了横向配置，自下而上，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顺序罗列二十八天，上为四梵天（四种民天），再上三天为玉清天、上清天、太清天，最高处称为大罗天。尽管当时的人们离开登上太空还为时很远，但是这一对于天的构成的分析，反映了人们对于天的无限深远已有一定认识。道教在构成天的每一天界内部都认为有天神居住，认为修道之士可随道行高深而登天。

唐代道士潘师正就称,“初从凡学,受持法戒,行无缺犯,则名系仙录”,入灵山洞府,然后逐步“进道”,登上诸天,最后登上大罗天,“与道同真,常湛极乐”。^[1]

南北朝时期形成的道教三十二天,各天均有天神。如:东方八天之一的太黄皇曾天,帝名郁纁玉明;南方八天之一的赤明和阳矢,帝名理禁上真,等等。但是,在东汉的五斗米道时,奉祀的仅仅是一个混而统之的“天官”。天官与地官、水官合称三官,民间俗称三官大帝。南朝陆修静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中称,“三官所执,生、死、苦”,意思是天官管理人和万物之生。天官的职能尽管后代有众多的变化,但是“天官赐福”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在先秦时期,中国的传统宗教就已有日神、月神和星辰神,并且先后有祭日、祭月和祭祀星辰的仪礼。道教在将这些天体神灵纳入其神谱时,给以一些新的神名。《太上玉晨郁仪结璘奔日月图》中称日有五帝,月有五夫人,一些与天有关的气象之神,如风神、雨神、雷神、闪电神等等,道教也赋以新的神名。总之,道教的“三十六天”是神仙所居之地,南北朝时期造作的《桓真人升仙记》就称那里“有长年之光景,日月不夜之山川,宝盖层台,四时明媚。金壶盛不死之酒,琉璃藏延寿之丹,桃树花芳,千年一谢,云英珍结,万载圆成”,曲折地反映了道教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想。

地道。道教继承上古时代起对地的奉祀传统,并以道的思想贯串于地和与地有关的山川等中,形成了其教义的“地道”部分,包括:地的形成、地的方向和有关地貌的神灵,等等。

汉代的道家著作已经提出,地是由阴浊之气凝滞而成的。道教的创世说也继承了道家的说法,称地的形成是浊阴之气的沉降。五斗米道奉祀的

[1] 《道藏》,第24册,第787—788页。

“三官”中,就有地官和水官。大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元始天尊说三官宝号经》就称“上元一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1] 地官之职是主阴、主管人和万物之死,为死者赦罪。水官之职主中和,为人消灾。地、水两官的功能尽管后来有许多变化,但是,“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信仰,一直延续至今。随着天的构成学说的形成,道教也按天的方向配置,称地上有三十六土皇。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引用《洞真外国放品经》称地有九垒,每垒有四色、正音、行音、游音和梵音等土垒,九垒土皇各有名讳,分别于固定月日和节气上天奏告,沟通天地神灵之间的联系。^[2]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将传统山川崇拜的神祇,纳入自己的神谱,并称各司其职,分担了“地官”主死的部分功能。唐五代道士杜光庭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称,“乾坤既辟,清浊肇分,融为江河,结为山岳,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圣上真主宰其事”,五岳山神各有名号,“皆高真上仙主统,以福天下,以统众神”。^[3]

土地同人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汉民族较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因此,早在先秦就有聚居的城池和村落。《礼记·郊特牲》称,“天子大蜡八”,其中“水庸七”,^[4]水即隍,庸即城,一般认为这就是祭城隍的开始。六朝时,城隍之祀逐渐普遍,道教也纳入其神系。《太平御览》卷五三二引《礼记外传》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故建国,君民先命立社”,^[5]社有神,主土地,生五谷。在东汉时,社神又区分为社公和社母,大约在六朝时社公和社母逐渐演化为

[1] 《道藏》,第9册,第840页;第5册,第513页;第2册,第36页。

[2] 《道藏要籍选刊》,第10册,第10、47—48页。

[3] 《道藏要籍选刊》,第7册,第187—189页。

[4] 《十三经注疏》,第145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引该书同此版本。)

[5] 《太平御览》,第2413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引该书同此版本。)